『中國學』第84輯 (2023.09.30.)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23.84.84.8
pp.151-173. ISSN : 1229-9618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伦理结构与伦理意识的比较

程竹慧* · 朴明真**

【目 录】

1. 绪论
2.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线与伦理意识
   1) 伦理线的展开——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设置
   2) 伦理线的延伸——作者自评与伦理意识
   3)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伦理线中伦理意识的比较
3.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结与伦理意识
   1) 伦理结的形成——类型叙事中的伦理困境
   2) 伦理结的传统解答——因果报应叙事的伦理意识
   3)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伦理结中伦理意识的比较
4. 结语

【摘要】

文学文本中的普遍性伦理现象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问题体现在伦理线和伦理结中，二者又共同织就了文学文本中的整个伦理结构，深刻反映了作品中的伦理意识。其中，伦理线从宏观方面表现了作品的伦理主线及主导性伦理问题的发生发展状况；伦理结从微观方面表现了作品中的基本伦理问题及矛盾和冲突还有伦理困境的形成与消解。因此，本文选取中韩两国古代志怪小说的代表作『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主要从两部作品艺术设置中的伦理线和伦理叙事中的伦理结这两个方面来分析作品中的伦理结构和伦理内涵。包括艺术设置中非人形象与作者自评对伦理线的体现，以及

* 程竹慧，第一作者。岭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系博士生（chengzhuhui1234@gmail.com）。
** 朴明真，通讯作者。岭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系教授（piao406@ynu.ac.kr）。

类型叙事对伦理结的建构和因果报应叙事对伦理结的解构这几个方面。运用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探讨两部作品中体现出的不同层次的伦理意识和伦理内涵，阐述不同国家时代背景下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原因，提供伦理启发。

【关键词】『聊斋志异』；『天倪录』；伦理线；伦理结；伦理意识。

1. 绪论

『聊斋志异』是清代艺术水平最高的文言小说作品集。蒲松龄（1640-1715）吸收了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叙事传统，用幻想的手法构建了种种鬼灵精怪故事。鲁迅先生称之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1)]。『聊斋志异』借志怪故事，反映出中国古代逼真的社会现实，影射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伦理颠倒现象，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同时也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理想社会无比的向往之情。

『天倪录』是朝鲜时代水村任堕（1640-1724）著述的汉文野谈集中的代表作品，只有手写本，现有6种异本，其中天理大收藏本收录最多故事，有61篇作品。由此可见原本『天倪录』有61篇以上的故事。“天倪”来源于『庄子』，指的是“天空的极端”或者“自然的分际”，意思是说天地自然的某种状态和现象。[2)]作品通过生动的笔触记叙了各地的奇人异事、鬼怪故事等难以理解的自然的奇异现象与人间产生的神奇故事，沟通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从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封建统治下伦理混乱的社会背景和百姓希望建立新的伦理秩序的精神要求。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作者蒲松龄和任堕生活在同一时期，他们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思与设置，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志怪小说的题材进行叙事，以这些怪异的故事反映伦理问题，从而达到指导现实生活的深刻目的。虽然两部作品在艺术水平上有一些距离，但是作品中不乏相似的类型叙事，而这些叙事中又体现出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同时具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与思想内容。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把握中韩两国相似的文学作品中的异同，特别是本文拟通过两部作品中体现出的伦理意识为切入点分析两部作品的丰富内涵，这很有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

因此，本文拟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结构——伦理线（Ethical line）和伦理结（Ethical knots）的艺术表现，并发现这两部作品在反映的伦理思想和具体的伦理问题上都具有可比性。『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中通过一系列的神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135。
2) 임방 지음, 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23。

怪故事展现封建统治下的社会情貌，其中更蕴含了作者的深刻伦理思想和政治寄托。由此可见，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天倪录』，都包含了一定层面的伦理意识。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阐释和评价文学的批评方法。”其特点是“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学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及其存在的伦理原因，并对其作出价值判断。”[3]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是一种更深层次上的文本解析过程。通过梳理作品中的伦理线和伦理结，便于研究者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问题和把握文学文本的伦理走向，从而达到诠释作品的伦理意识这一重要目的。这也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要完成的终极目标。本文拟采取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探讨『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具体的伦理结构及其所体现的伦理意识，主要表现在线性贯穿的伦理线与节点性反馈的伦理结上，伦理线即文学文本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伦理结即文学文本中的矛盾与冲突。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结构中伦理线主要是通过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构思与作者自评组成的。『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千奇百怪的狐鬼精怪形象，这些形象虽与人有差异，却是与人有脱不开关系的重要形象群体，它们身上的“人性”都有迹可循，因此其思想、行为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赋予伦理的意义。分析『聊斋志异』作者自评中的善恶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品中树立的伦理道德标准。『天倪录』侧重于对奇人奇事进行反映和思考，作者在自我评点中不仅会对异闻进行一定的考据，也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价值判断形式。任堕通过记叙和评价鬼怪故事，以期达到对民众的启发和教化作用，就是间接地向百姓阐发自己的一套道德准则和伦理观念。

两部作品的伦理结构中伦理结的形成主要以婚姻家庭和社会批判两种类型叙事中的伦理困境来体现，此外因果报应叙事中又蕴含着对伦理结的传统解答。典型故事中伦理结的独特设置和展开方式，使作品中包含的深刻伦理意识表现地更加鲜明。所以无论从作家主体还是从作品本身出发，这两部作品都与伦理结构和伦理意识之间有脱不开的重要关系。

本文拟通过对清代的『聊斋志异』和朝鲜时期的『天倪录』这两部作品之中伦理结构和伦理意识异同的解析，从伦理线、伦理结的角度入手，对照两部作品中的伦理问题，从而达到挖掘文学文本中的伦理意识和解决文学文本中伦理问题的目的。

2.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线与伦理意识

从伦理叙事中来看，『聊斋志异』以狐鬼世界的奇闻轶事为依托展现真实世界的面貌，突出作者对封建社会伦理问题的思考；『天倪录』重视奇异现象给人类带来的多种变化，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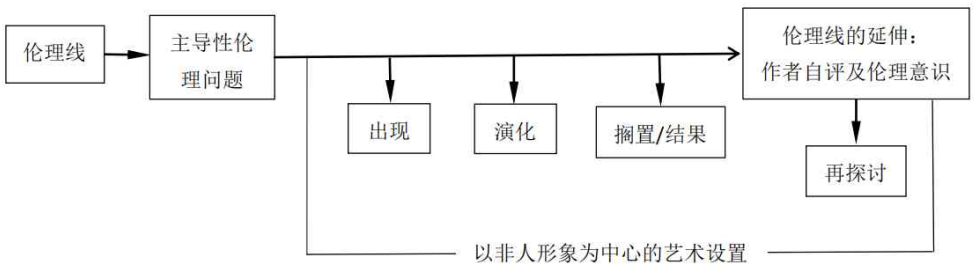
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p.1。

客观的角度进行伦理启发。艺术设置通过其丰富的文学表现力，使单部作品显示出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独特魅力，是区别于其他作品的鲜明特征。

文学文本的整体伦理结构主要由伦理线和伦理结形成，其中伦理线代表骨架，伦理结相当于血肉，二者建构一部作品全部的伦理内容，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伦理线的表现形式就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伦理线揭示的是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出现、发展、演变和解答的过程。”[4] 伦理线串联整部作品，是伦理叙事中伦理问题的发展变迁过程。伦理结是伦理叙事中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症结所在，揭露基本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伦理线和伦理结的组织构建方式展现了作品的伦理高度。伦理线既可以指整部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又可以指每一个小故事，或每一种题材、主题、主要人物类型较为相似的故事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伦理线揭示的主导性伦理问题与文学文本的主旨有密切关系，是作者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种伦理思想的表达最主要的反映就是在作品的艺术设置方面。『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独有的艺术设置手段构成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伦理线。

『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中的伦理线是主要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构思与作者自评交织的艺术设置中体现出来的。首先，这两部作品中艺术设置上最大的成功点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形色各异的神仙鬼怪等非人形象，这些形象效仿人的心理和行为，具有伦理意义。两部作品中以非人形象这一主要人物类型的故事来突出地体现伦理线，即伦理问题的出现、发展和演变。其次，『聊斋志异』和『天倪录』在行文形式上还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故事与作者自评相结合，作者的评论性话语是对故事进行升华，因而这两部作品中的伦理线又以作者自评的形式来进行伦理内涵上的延伸。『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的伦理线与伦理意识之间具体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线与伦理意识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pp.265-266。

1）伦理线的展开——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设置

『聊斋志异』和『天倪录』这两部志怪作品中的部分哲理性篇章均以记录鬼怪故事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伦理问题，因此这两部作品中的伦理线即主导性的伦理问题主要就表现在作品的寓言性故事中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构造上。这两部作品虽然都记录了神怪故事，也都以非人形象为突出的特点来进行艺术表现，但两部作品中非人形象的艺术设置手段和表达方式都是不同的，并且作者借助非人形象故事表达出的伦理意识也相差较大。非人形象是作品模仿人类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一类形象，他们是人的特殊代表，作品以非人形象进行伦理叙事，目的是以夸张、比喻等手段，更加形象、具体地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伦理问题。通过对这些非人形象进行解析，我们可以反推作者的深层伦理思考。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构思也是伦理线中最能反映作品伦理价值的一环。其中的非人形象蕴含着两个部分，首先，非人形象的塑造是作者伦理思想在典型人物方面的折射，是非人故事中伦理问题的起始；其次，非人形象及其伦理性的活动是对作品中主导性伦理问题的进一步描述，是寓言性故事的发展和演变。因此，非人形象的艺术塑造及其伦理活动直接引发伦理问题的出现和演化，展示出相对复杂的伦理结构。

伦理线是伦理结构中的突出线性部分，是作品结构中的逻辑主干与核心，而『聊斋志异』和『天倪录』这两部作品中的伦理线就是伦理观念的线性结构显现，是作品伦理状况的基本反映。两部作品以非人形象为中心构造出一条较为完整的伦理线，即在幻想与现实结合的伦理环境中突出表达伦理问题，解析伦理意识，并采取非日常叙事，体现出主导性伦理结构的独特艺术设置。

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更应该拥有属于自身的文化特色的艺术设置和讲故事模式。中国古代的小说作品描写幻想世界，并在此世界中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非人形象，可以说非人形象是反照人类的镜子。作者通过幻想世界的非人形象或英雄人物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同时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例如中国古代小说中最受人们的欢迎的著作『西游记』，是以非人形象为主构造幻想世界的代表作。到现在『西游记』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IP，不断地向着大众媒介的各个领域渗透和延伸。[5)]

从『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两部作品对非人形象的塑造上来看，非人形象虽然与人有较大的差异性，他们的身姿面貌、语言、心理等特征与人不同。但两部作品对非人形象进行艺术性创造的目的是通过幻想的方式，描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伦理关系。作品采用非人形象设置来影射现实生活中的人，突出了伦理矛盾，引发伦理线，丰富了作品的伦理思想。

---

5) 韩宇翔、朴明真，「流媒体平台上以『西游记』为原型的IP产出与市场反应——以动漫『西行纪』为中心」，『中国学』，第80辑，2022，p.91。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非人形象故事中侧重非人形象的伦理活动，作品以非人形象比喻人，将人的伦理判断和伦理行动编入非人故事中，逐步推动伦理叙事的发展。通过对非人形象伦理活动的叙述，展现人类社会中有悖伦理的异常现象，这正对应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当中伦理线揭示文学作品中伦理问题的过程。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神、狐、妖、鬼等诸多非人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与人有不同之处，但都脱胎于人。他借助人类现实世界类推创造出非人的幻想世界，并利用这两个世界作为基本发生域，叙写了人与非人之间的故事。『聊斋志异』中非人形象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总是拥有理性思考和自主行动的能力，其性格中又融入了人类的部分因素，指鬼神也通人情，因此就形成了一类独具特色的形象，如『婴宁』、『莲香』、『阿霞』、『夜叉国』、『王六郎』、『陆判』、『翩翩』、『雷曹』、『宦娘』、『牛痘』、『阿英』等篇章中的非人形象。作品通过人与非人之间的奇异交往，阐发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伦理性问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担忧和希冀。

作者笔下的女孩婴宁能够识大体，孝顺老人、敬爱丈夫，婴宁的行为符合特定时代背景下女子应相夫教子等伦理要求。丈夫王子服介意她的非人身份，她却愿意向丈夫和盘托出，并请求他帮自己安葬父母。“抚哭哀痛”[6]时真情流露的女孩很难将其与吃人饮血的鬼怪联系在一起。作品假借非人女孩婴宁这一形象，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中人伦纲常混乱的伦理颠倒的不良景象的不满。此外，婴宁兼具狐鬼两种特性，聪明的她会通过施展鬼术来惩罚觊觎她的男子。而现实中的女性受到男性的打压却无法反抗，此处作者更是以女子自比，感叹自己面对不公待遇却无计可施的悲愤之情。

天仙翩翩极尽人间妻子之能事，她不以和凡人罗子浮做夫妻为耻，不仅为他生育子嗣，还对他说“为君行酒，劝君加餐”[7]这种如人间妇女一般的话。然而仙凡殊途，罗子浮终因思凡归家，日后再寻仙界则已不能。作品通过想象，构建出以云为絮，裁叶为衣的仙界奇幻生活，那里摒弃了世俗的污秽，平凡而又简单的夫妻关系令人羡慕。仙界最终不可寻得暗讽现实社会的伦理混乱之状，表达了作者对现世无比的失望。莲香本是得道狐女，却愿意为所爱之人抛弃生命转为凡人，她“襟怀坦荡，通晓事理”[8]，更拥有身为人类女子也比不上的不妒之德。作品将非人形象赋予人的形式和为爱付出等意识，使其成为具有不同于人的本领的超凡形象的同时兼备人的性格和思想行动特征，这样的塑造就是对现实中人物的一种投影。

『聊斋志异』中的非人形象具有明辨善恶的伦理认知，对其伦理活动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决定伦理问题的最终走向。如『宦娘』中女鬼宦娘倾心于温如春和他的琴技，但碍于自

6）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155。
7）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441。
8）马振方主编，『聊斋志异评赏大成』，漓江出版社，1992，p.357。

己的非人身份无法与他正常交往，善良的她愿意为心上人牵线搭桥，最终成全了温如春和良工的姻缘。宦娘虽为鬼，却从无害人之心。作品对宦娘伦理活动的设置是对当时社会人与人交恶现象的一种反思，寄托了作者对心灵美好的女子和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无限期盼之情。『牛瘟』中的六畜瘟神不因自己的非人身份被陈华封识破而愠怒，反而担心黎民百姓会因牛瘟被放出而遭受灾难。当陈华封私藏治疗牛瘟的药方时，六畜瘟神又对他的私念实施了一定的惩罚。神仙对人言辞亲切，态度公正，虽掌握民间人畜的生杀大权，却不滥用。作品意在用神的言行对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进行讽刺，同时表达了对百姓生活的关怀之情。

『天倪录』中的非人形象与『聊斋志异』不同，记录鬼怪数量不多，特点也较为模糊，他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多有隔阂，未见深刻。作者任堕笔下的鬼多是没有具体形象和无法感知的，他们只能在夜间出现，作怪吓人或受人奴役。如『西平乡族点万名』与中对鬼的描述是“其形怪制，不可名状。”[9]而人鬼之间仿佛如现实社会中的上下级关系一般，“有若官府阅衙之状。”[10]点名迟到以及霍乱人家的鬼均被处以刑法，役鬼人对他们三令五申后才遣散众鬼的行为也直指世间的人际关系。作品借冥界的臣服关系讽刺人间的等级制度等伦理关系。『任实士人领二卒』中任实士人驱使自己的鬼卒惩罚与他象戏的输者，对夹道害人之鬼的态度又是“怒气勃然，高声呵责”，或“向空叱之”[11]。故事中杂鬼并未现身，作品通过诸多侧面描写来突出鬼怪无从探知的特性，反衬出役鬼人的高明。『天倪录』中的狐形象常见于『背负妖狐惜见放』与『手执怪狸恨开握』两篇中，他们总是化为美丽女子或变身为亲友，但不多时便主动或被动地露出了狐身真容，继而逃窜，与人相处的时间不多。狐女总是“微笑不对”、“亦喜而笑”，实则“口啮禽项甚猛”[12]。即便狐狸以美丽女子的身份作为伪装，也不能掩盖其害人的本性。故事中狐多狡猾，但人更加机智，总是能提早觉察出狐的异样。暗示作者对动荡社会中宵小之人的鄙夷与批判。

『天倪录』中非人形象的行为活动多受本性制约，带有志怪故事初期鬼怪伤人的普遍艺术性质，导致人与非人，亦即人与人之间交往困难的伦理问题。如『高城乡叟病化鱼』和『昇平族人老作猪』中讲述了人类忽然变异成为精怪的故事。幻化为动物的这些人都是封建家庭权力的掌控者，也代表了封建礼教的重要维护者。当具有绝对权威的父亲变成了怪物，家人应如何应对。故事中的人类在变异之后同时失去了人的外形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养在家中或立即为其办理丧事均不妥，最终将其放归，但后代仍为他们准备了衣冠毛发冢。丧葬不仅是后人对先人尊敬的体现，还是儒家伦理中的典型代表仪式。这表示后人不

9) 임방 지음, 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2005, p.414。
10) 임방 지음, 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2005, p.414。
11) 임방 지음, 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2005, p.416。
12) 임방 지음, 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2005, p.482。

愿承认亲人已经变成了妖怪，仍以礼待。作品借此表达了封建统治下对人主观能动性的消磨等伦理颠倒的现象，至此伦理问题被搁置，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聊斋志异』中的非人形象多具人性和物性共存的异化美，作品通过直接性的细节描写等艺术手法以及想象和象征等艺术构思对非人形象进行了艺术性的塑造，使其比人类形象更加丰满。他们在伦理活动中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摆脱人间既定的伦理准则行事。作品以此种非人形象和他们的伦理活动比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表达对美好社会的伦理寄托入木三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擅于运用真幻结合的手法，模糊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虚实相生中深化了拥有自我意识且极其类人的非人形象。他对非人形象的细节刻画就是对现实中某类人物的反衬，表达出自己独到的伦理思想和治世情怀。

而『天倪录』中的非人形象多保留非人的原始物性，作品通过间接性的侧面描写等艺术手段和映照等艺术想象对非人形象进行描摹，他们在伦理活动中又因缺少伦理思考和价值判断，使伦理问题多悬而未决。作品以非人故事指出封建统治之下人与人之间只存敌对或从属的伦理关系，表达出对社会现状的忧思和无奈。任堕的『天倪录』也采取了传奇的手法，不过，它对非人形象的塑造比较粗糙，较为单一化，往往采取衬托等描写手法将人与非人置于对立的伦理关系之下。但是，『天倪录』中的这种非日常性是与日常生活分不开的，非人形象可以说是沟通日常与非日常之间往来的媒介。他对非人形象进行描写主要是为了表达对社会现实中不平等伦理秩序的不满，在非人故事中作者对人物神勇的颂扬启发了百姓的觉醒意识。由此可见，『天倪录』是朝鲜时期较为独特的作品集，采取非日常性的题材，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短篇故事结构，较之其他作品相比拥有较为新颖的创作方式。

2）伦理线的延伸——作者自评与伦理意识

在故事中加入作者自评，是『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两部作品在行文形式上的共同点。作者自评不仅表达了作者对自我作品的情感的抒发和一种特殊性总结，而且是作者自我思想态度在作品中的具体投射。且自评与故事之间关系紧密，从作者自评的一部分哲理性篇章中不难推测出作者的评论包含着关于人生、事物等的伦理体悟和思考。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讲作者自评可以视为是作品伦理线的一种延伸，从评点的部分哲理性内容中可以归纳作者的伦理观念。『聊斋志异』中作者自评的形式为“异史氏曰”，『天倪录』中则用“评曰”的形式来表示，艺术行文形式是作品艺术设置中重要的一环，作品通过外在的文章形式设置表达作者内在的主旨思想。

故事加作者自评的文章结构形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较为直接地传达出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感受。『聊斋志异』成功地将史传文学中的“论赞”借鉴到文言小说的叙事体例当中并发展壮大[13)]，至此自评成为了“论赞”小

说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聊斋志异』的评点共有195个，或多或少都包含着伦理批评。作者通过“异史氏曰”品评故事中的人物行为，可以说是加强作品伦理意识的有效手段。14)

『天倪录』的“评曰”可以说是受到了前代叙事体裁中“传”的影响。韩国的研究者认为作者自评是“传”与“野谈”体裁之间交互的一种形式。15)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朝鲜时期“野谈”体裁的发展过程。而且，作者任堕经常提及中国唐代传奇和宋代笔记作品，笔者也可以推测他是受到了中国志怪、传奇类作品的进一步影响，吸收了作者自评的这种写作形式。『天倪录』的“评曰”中经常提到对非日常性的奇事之虚诞的警惕，指出要与神异的现象和奇异的故事保持距离。16)

从伦理结构的角度看，在『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部分哲理性篇章后的作者自评是伦理线的延伸。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伦理线反映的是作品中的突出性伦理问题，与作家的伦理意识有密切关系，在故事加自评的文章结构形式中，故事与自评一齐作用于作品主旨，这种艺术形式更能反映出作者的伦理追求。与形象艺术构思中的伦理线不同，故事加自评艺术形式中的伦理线集中体现在故事与自评的关系之中。伦理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演变在故事中发生，伦理问题的解决有时则在自评中，是作家伦理态度在故事之外的延伸。

『聊斋志异』的评点篇目数量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二，评点重心分布在富含寓言性的故事类型中17)；『天倪录』的评点数量及分布则非常有规律，在题材相同或相近的两篇正文故事之后均有三五句评点内容。且『聊斋志异』自评主观性强，伦理内涵丰富；『天倪录』自评客观性强，伦理内涵较少。

『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带有很深刻的主观评价特点，直接反映了作者理想的伦理观和社会观。18)“或叙或议，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19)如『鬼哭』篇的自评中作者用以德劝鬼之言来表达对官宦的厌恶和对百姓的同情；『罗刹海市』篇中作者又以美丑对照的方式凸显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悲愤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之情等。“异史氏曰”：“借题发挥，触情感事，思接千载，视通八方，泄胸中之“孤愤”，明道德之是非

---

13)刘尚云，「论『聊斋志异』叙事主体的自觉意识」，『长城』，第12期，2009，p.76。

14)이근석，「『요재지이(聊齋志異)』의 논찬(論贊)으로 살펴본 이야기의 윤리적 기능」，『중국어문학지』，제63집，2018，pp.212-215。

15)박현숙，「조선후기(朝鮮後期) 야담집(野談集) 소재(所載) 기이담(奇異談)의 특성(特性) 고찰(考察) -『천예록(天倪錄)』을 중심(中心)으로」，『어문연구』，제36권 제2호，2008，p.416。

16)임방 지음，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27。

17)邓大情，林青，「中韩古代小说自我评点之比较——以『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为中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2014，p.50。

18)李娟，「“异史氏曰”——『聊斋志异』中的干预叙述者」，『河池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2006，p.53。

19)黄英龙，「『聊斋志异』曲终奏雅艺术探析——评“异史氏曰”的得失」，『忻州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2009，p.4。

。”[20]

『聊斋志异』中的作者自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自评的篇幅一般较长，并且是通过运用典故或记叙相似的故事来阐发作者的伦理认识。如『司训』中的“异史氏曰”部分，作者引用『耳录』中的另一则相似的教官故事，来表达对贪污腐败现象的不满之情。第二种，正面歌颂世间的美好情感，表达出作者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伦理颂扬。如『娇娜』“异史氏曰”：“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21]乱世之中如果能有这一份真挚的友情实属难得，体现了作者对美好人情人性的赞扬。第三种，无情抨击封建社会中的假恶丑。如『李伯言』的自评中以阴间司法的严明影射阳世刑罚的不公，提出：“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耳！”[22]传达出作者对现实世界执法不公正的极度愤懑之情，又暗含了作者对普遍性因果报应的希冀。此外，『念秧』是唯一在篇首位置出现“异史氏曰”的，此处的作者自评又具有总领全文、提纲挈领的突出作用。无论哪种哲理性自评，都与作者的伦理意识有密切的关系。

『天倪录』的“评曰”内容紧扣前面两则故事的主题，其评价特点还与传统志怪文学评论中考证故事的真实性等有很大的相似和继承关系。其谈古论今，偶有惊讶、叹息之情，是作者客观伦理情感的略微体现。如『菩萨佛放观幽狱』篇后自评中将天堂地狱仅数百步之隔的事轻易断定为荒唐，以示作者思想的保守性和客观性；『潦泽里得万金宝』和『海岛中拾二斛珠』篇后的自评中作者提出对侥幸的警惕，强调“积善行仁，自获神助”。[23]；『招后裔教以真的』篇后的自评显示出作者对祭祖等传统孝道伦理的维护之情。

『天倪录』的“评曰”内容大致也有三种类型。首先，以“余尝闻”、“曾见”、“岂不信”、“验之”等为关键字进行的评价，作者旨在以这些可靠性的话术，加强读者对作品中所记录的事件的真实感受，突出故事的客观性特点。如『昇平族人老作猪』的“评曰”中提到：“曾见传奇……而穷思之，万物莫不有变化矣。”[24]看似使用推测性的话语，实则用哲理性的思辨之语对奇闻轶事的发生给予了肯定。其次，以“亦怪矣哉”、“奇乎”、“异哉”等为关键字进行的评价，作者任堃擅长将日常与非日常现象结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如『尹氏平遥哭妹丧』的作者自评中有“非有神术，曷能视千里如咫尺乎？”[25]将怪事、神迹等与人民日常生活相结合，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期许。再次，言语铿锵，观点较为鲜明的自评。如『簪桂逢重一朵红』的“评曰”中：“妇人志节操概……终始完洁，料事如神。”[26]是一种对拥有美好品格的女性的直接性赞美之情的抒

20)张慧禾，「『聊斋志异』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语文学刊』，第5期，2004，p.15。
21)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3。
22)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307。
23)임방 지음，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492。
24)임방 지음，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433。
25)임방 지음，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401。

发。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的伦理线主要由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构思与作者自评的艺术形式构成，其中非人形象艺术构思中的伦理线又表现为非人形象的塑造及其伦理活动两部分。作品中对非人形象的描摹是对伦理线展开的基本过程的阐述，作者自评却是对伦理线的一种升华。

3）『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伦理线中伦理意识的比较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两部作品都通过伦理线的不同表达方式展现出了作者对伦理问题的复杂思考。伦理线是伦理叙事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的表现，且在两部作品的线性逻辑关系，即主导性伦理问题的出现、演化以及搁置等发展进程中，虽然都采用了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设置方式，但两部作品中对非人形象的立意并不相同，非人形象的塑造及伦理活动几乎贯穿在两部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之中。因此，主导性伦理问题的出现和演化，以致结局中都涉及以非人形象为中心的艺术设置。而哲理性作者自评的伦理意识作为伦理线的延伸部分，以主导性伦理问题结局以外的形式加入到了这段线性的伦理逻辑关系当中，是对当前被搁置的伦理问题的一种再探讨，同时又深化了作品的伦理主题。

『聊斋志异』中的非人形象以人为映照，总是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独特的行为处事方式，从非人形象的外貌、品德再到他们为爱献身等做法，都显示出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赋予的寄托，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真善美的无限追求和超人的伦理观念与意蕴。例如蒲氏笔下的婴宁虽为鬼怪，却展现出了人世间的情爱与追求。蒲松龄借助自己创造出的众多非人形象表达了他对封建统治的怀疑，期望人类现实社会中也能拥有幻想世界中非人形象与人类之间发生的种种美好故事。而『天倪录』中的非人形象并不具体，往往与人关系疏远，是人的反衬，非人形象的伦理活动与人类似，但充满了等级秩序和私人谋划，例如任堃笔下的狐鬼等非人形象对人总是持有伤害或恐惧的不良态度与行事风格。『天倪录』以非人形象故事突出人的灵活机动性，暗示了现实社会中小人的悲剧结局，更多地表达了作者对民众生活、对新的社会现象的关注和反思。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哲理性作者自评除去分类和表达情感的不同之外，两部作品在题材相同的情况下故事加自评中对伦理线的解答和延伸也并不相同。例如同为人与蛇题材的故事，『聊斋志异』中的『蛇人』篇中，灵蛇变得像人一样通情达理，作者不仅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人蛇之间亲密互动和眷恋不舍的情状，还在“异史氏曰”中表示蛇很有情，并直言那些不听人言、恩将仇报的人不如蛇。反观『天倪录』的『故相第蛇魂作祸』中的蛇却只有

26) 임방 지음，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431。

凶残的表现，且人与蛇之间从最初就是互相敌视的伦理关系。『故相第蛇魂作祸』篇中蛇被残忍杀死，其魂也投以经久不散的剧毒向人复仇；『武人家蟒妖化子』篇中蟒与人之间也经历了种种因果报应的不良纠葛。“评曰”中认为蛇有报而人无报，表达了对无端被杀的百姓的同情之情，并愿与君子共同探讨人生的道理。人鬼交往方面，“评曰”中指出“人之畏鬼太过”[27]，也表明了人鬼之间相对立的伦理关系。而『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陆判』篇中人鬼阴阳不相隔，坦诚相待，人与鬼乃是知心朋友。“异史氏曰”中感叹人世间的人却不能像人与鬼一般深交，不懂知恩图报，体现出作者对人伦关系凄凉的担忧。

总之，无论是『聊斋志异』还是『天倪录』伦理线中体现出的伦理意识，都是作者在伦理探寻过程中汇集成的伦理观念的体现。贯穿『聊斋志异』中的伦理线展现出了作者对传统社会中畸变的人伦关系与社会秩序的深刻思考，饱含了对旧制度、旧思想的不满。作品表达了隐藏在神鬼故事外衣下的，作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的担忧和对纠正社会不合理之处的伦理希望。而『天倪录』中的伦理线则通过对鬼怪形象的塑造和对异闻故事的介绍，间接表达了对下层百姓的同情；又在祭祀等故事中传达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顺承和维护，以期对民众起到一定的教化和伦理启迪的作用，具有局限性。

3.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结与伦理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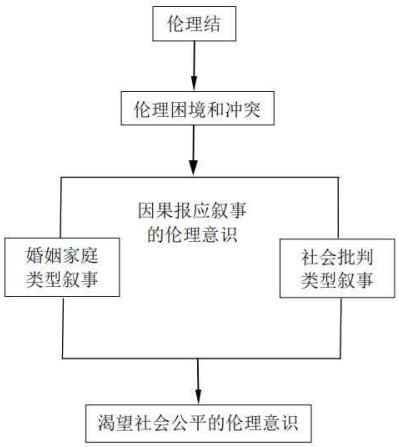
伦理线和伦理结不仅表示伦理叙事中点线结合的一种交叉缠绕的关系，它们还一起构成了文学文本的全部伦理结构关系，从而展现出文学文本中的伦理根源之所在，二者缺一不可。“伦理结是文学作品结构中矛盾与冲突的集中体现。伦理结构成伦理困境，揭示文学文本的基本伦理问题。”[28]伦理结是伦理线上的伦理冲突和困境，通过对作品中的伦理结进行分析或解构，可以推知其中蕴含的伦理意识，明确作品的伦理价值和文学风格。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伦理结的形成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类型叙事”和“社会批判类型叙事”这两种特定类型叙事的伦理困境之中，它们在两部作品当中都占据较多的篇幅与突出的地位。这两类叙事的伦理结在预设和后置方面有突出的特色，即导致矛盾冲突的缘由是在故事发生前还是后进行阐释。每个类型叙事显示出多样的伦理意识。此外，『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往往对伦理结赋予了传统意义上的消极解答，即表达了“因果报应”的思想。两部作品在伦理叙事中可以说是将伦理结与“因果报应叙事”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果报应叙事中虽蕴含普遍的善恶道德准则，却存在解决伦理问题上的局限性。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作者对社会公平的期待之情。『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伦理结与伦理

27) 임방 지음，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494。
2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p.258。

意识之间具体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图2>『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结与伦理意识



1）伦理结的形成——类型叙事中的伦理困境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伦理叙事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伦理结的形成过程为基础的，在作品的伦理叙事中，伦理矛盾和冲突无法解决，伦理困境也因此而产生。『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中的伦理结指的是整部作品中每一种题材、主题等类别较为相似的文本故事中的矛盾与冲突，或伦理困境的集中体现。伦理叙事中的伦理结是文学文本作品当中某些特定题材叙事中的矛盾与冲突之所在。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提出，“文学类型应视为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分类编组”[29]，那么类型叙事指的就是题材、主题等类别较为相似的文本故事展开，类型叙事在具有模式化、典型性等突出的特征，是文本分析中重要的印证材料。

『聊斋志异』中虽然具有极多虚幻的人物与神异的故事，不过都是作者借此对现实官场和社会制度进行的强烈批判。蒲松龄的创作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十分关心当时的政治与民情，因此，作品通过幻想的艺术设置逼真地刻画出现实中的矛盾冲突，从而体现了作者的伦理意识。

『天倪录』的妙处在于作品内容超越了鬼神、神仙故事，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与之交织在一起，使得故事更为丰富、生动。这部作品可以称为能照看十七世纪人情世态的有价值的资料。由此可见『天倪录』的文学性突出体现在非日常性与日常性的巧妙结合

29) 韦勒克、沃伦，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p.257。

上。作者在以日常生活为主而形成的伦理故事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伦理思想。

具体来讲，『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均主要从“婚姻家庭类型故事”和“社会批判类型故事”这两个方面进行伦理叙事，婚姻家庭类型叙事注重表现家庭夫妻伦理和男女婚恋伦理，社会批判类型叙事注重表现封建制度统治下人物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行为。两种类型叙事中以个人伦理和社会伦理相结合的方式叙述了客观环境下的伦理困境和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婚姻家庭类型叙事中的伦理禁忌和社会批判类型叙事中的伦理混乱。充分表现出伦理结形成过程中矛盾的伦理内涵和渴望社会公平的深刻伦理意识。

（1）婚姻家庭类型叙事中的伦理禁忌

封建社会末期的伦理环境显然是矛盾、冲突不断的，导致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诸多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封建家长对子女婚爱自由的掌控和封建男权对妇女要求平等的鞭挞。古代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深入人心，自古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且男子三妻四妾习以为常，使得夫妻二人相爱相守变得更加困难。封建社会后期悍妒妇盛行，女子或本性凶悍，或因妒继而生悍，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已成为了不能忽视的现象。妒妇悍妇的伦理身份非常特殊，她们既是封建社会王权、父权、夫权等绝对权力层层压迫的对象，又是封建社会末期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之一。在『聊斋志异』和『天倪录』婚姻家庭类型叙事中，由于叙事主体触犯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男尊女卑等伦理禁忌，动摇了封建社会传统纲常的根基，新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了伦理困境。妒妇悍妇的伦理身份又非常特殊，她们既是封建社会王权、父权、夫权等绝对权力层层压迫的对象，又是封建社会末期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之一。『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中均塑造了一些典型的妒妇、悍妇形象，且这两种妇女形象又常常融为一体，女子或本性凶悍，或因妒继而生悍，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已成为了不能忽视的现象。妒妇、悍妇形象的盛行是由于当时社会女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所导致的，但显然各个阶级都无法接受如此凶悍的女性，最主要是因为她们触犯了男尊女卑的伦理禁忌，动摇了封建社会传统纲常的根基。

“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形成与变化从制度上说都是以禁忌为前提的。”[30]伦理禁忌是伦理秩序的前身，禁忌就是为了维护伦理秩序而存在的，要成为社会中的人就必须要遵守秩序，保守禁忌。封建家长是父权等高级权力的伦理代表，他们经常对子女的生活进行禁锢和干预，儿女的思想和行为长期遭受父母的打压，因此他们的自由恋爱和私立婚约是对家长制提出的挑战，这也属于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一种伦理禁忌。

蒲松龄在『连城』、『鸦头』、『阿纤』、『红玉』、『青凤』等篇中均表现了封建家长对后代

30)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p.262。

婚恋自由行为的摧残和压迫。『连城』中乔生与连城两情相悦，连城的父亲史举人却嫌乔生太穷，乔生为了给连城治病不惜割下自己的心头肉，史举人又因畏惧权贵而拒绝将女儿嫁给他。乔生相思成疾，连城以死明志，上演了一出封建家族长统治下的婚爱悲剧。真挚的爱情却得不到祝福，皆因他们违反了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理念而触犯伦理禁忌。『鸦头』中的鸦头不仅是母亲赚钱的工具，还受到了她的种种虐待，“女执不愿，致母鞭楚。”31) 当她遇到心上人时也只能与对方一起私奔，不久又被母亲“揪发提去。”32) 鸦头的姐姐是母亲决议的坚实拥护者，她没有自己的进步思想，对妹妹毫无怜悯之心。只道：“婢子不羞，随人逃匿！老母令我缚去。”33) 拥有真善美心灵的鸦头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是她冲破伦理禁忌的体现，“从一者得何罪？”34) 是鸦头对自己不公待遇的呐喊。奈何母命难违，矛盾的两方最终没有达成和解。

由于古代妇女长期处于底层地位，她们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造就了诸如妒妇、悍妇等这一类特殊的女性形象。人的本能在受到文明压抑时最彻底的表现就是针对亲人的性和暴力。35) 她们因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本能而对亲人施行暴力行为，就触犯了伦理禁忌，进而破坏了古代伦理环境中的伦理秩序，成为了恶的化身从而受到批判。『聊斋志异』中的妒妇、悍妇群体，诸如『马介甫』中的尹氏，『张诚』中的牛氏，『江城』中的江城，『邵女』中的金氏等等。她们都非常心狠手辣，不仅遍行不孝不悌之事，而且屡教不改，手段也极其残忍。尹氏是悍妇的典型代表，她鞭打丈夫，对待公公像对待奴仆，导致侍妾流产等桩桩件件都是人伦纲常之大过。江城是妒妇的典型代表，她辱骂父亲，顶撞公婆，连自己的亲姐姐也不放过，经常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冤枉丈夫和丫鬟有染，竟然割下二人的肉。『聊斋志异』塑造悍妒妇时每个具体人物的性格和行为都不相同，江城是美型悍妒妇，她捉奸时展现出了过人的隐忍和智慧。而尹氏只是有勇无谋，欺软怕硬的悍妒妇。『天倪录』中主要以悍妒妇故事为婚姻家庭类型叙事中的典型，她们的行为是对封建父权和夫权等家长制的消极反抗。『成进士悍妻杖脚』和『禹兵使妒妇割髯』这两则故事中描绘了彪悍的女性形象。懦弱的成进士稍有令其妻子不满意的地方便被打骂不休，还总被囚禁，逃出家时竟无人敢收留他。被妻子追回后，施以更残暴的重刑。禹兵使虽为勇武有力的军官，却被好妒的妻子杖臀割髯。『天倪录』多直接性地描写悍妒妇，并用对比的手法来表达男子的懦弱和女子的凶狠好妒，突出表现了妇女的悍妒之状。

『天倪录』在婚姻家庭类型叙事中的伦理结多为预设，开篇直接指明悍妒妇的身份，并对其行为大加鞭挞，使之与社会普遍的伦理道德法度相悖，表达出悍妒妇与伦理禁忌之间

31) 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03。
32) 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04。
33) 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04。
34) 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604。
35)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p.261。

的冲突和矛盾普遍存在且无法改变的伦理困顿。『聊斋志异』中的妒妇、悍妇形象比『天倪录』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城』中却采取的是伦理结的后置，在伦理叙事中一步步揭示江城是因恃丈夫宠爱而妒，因不满公婆而悍，交代了伦理结的形成过程，表现出悍妒妇的复杂性。预设伦理结使冲突自始至终一直存在，加剧了伦理矛盾。而后置的伦理结则使情节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揭示了矛盾不可解决的深层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婚姻家庭类型叙事当中的伦理意识不光是个人伦理问题，也包括社会伦理问题。

（2）社会批判类型叙事中的伦理混乱

伦理混乱指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改变所造成的伦理困境，或“既有秩序遭受破坏、道德观念发生冲突、巧合、误解等。”[36]伦理混乱是伦理困境的前提和诱因。封建社会末期的伦理环境是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爆发的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昏庸和管理阶级的腐败等不良风气的影响，导致社会伦理的扭曲和崩坏。尤其体现在官吏制度和科举制度等社会制度方面，任选制度的不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心理结构，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造成不可磨灭的尖锐的伦理冲突和伦理混乱。『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均涉及社会批判的伦理叙事，作品以夸张、戏谑的笔法展现了不平等制度下矛盾冲突不断的社会状况，表现出封建社会伦理秩序和伦理意识的改变带来的社会混乱现象。

『聊斋志异』中『梦狼』、『冤狱』、『续黄粱』、『促织』、『考弊司』、『公孙夏』等为批判官吏制度的经典代表篇目。『冤狱』中昏聩县令只知道用酷刑屡次将不是凶手的百姓屈打成招，『梦狼』中通过幻化的手法表现出贪官污吏行贿受贿、无尽谄媚的丑态，并给予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县令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却不行使正确的伦理职责，反而昏庸武断，欺上压下，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失衡。『续黄粱』中曾某在梦中做了宰相后睚眦必报，强娶妇女，滥用刑罚。他在被揭发后被处死，在地府中也受尽了百般的折磨，即使重新投胎还是生活困苦，最后又被凌迟。蒲氏安排曾某下地狱受油炸等酷刑，旨在批判伦理混乱下官吏制度的极度不合理之处。『促织』篇中华阴县令和衙吏为了迎合圣上的喜好，对穷书生成名极尽压迫，随意责打。当成名因为儿子变成擅斗的蟋蟀获得富足的生活时县令又来巴结他，前后对比使县令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官吏原本代表的伦理身份应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但他们由于一己私欲，或为了投高层统治者所好，而做出泯灭良心或违反制度规定的事。官吏贪污执法的不良伦理意识导致他们与正义伦理相违背，长此以往，导致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混乱问题。

---

3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p.258。

『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科举考试的小说近百篇，不仅写到了关于科举的方方面面，而且记录了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痴迷、批判、怀疑、反思、超脱等种种情感。”[37]如『司文郎』、『于去恶』、『饿鬼』、『叶生』等。其中最典型的是『于去恶』，于去恶的落榜和补录，陶生屡试不中，最后因为张翼德的正义造访才纠正了科场的歪风邪气。方生文采飞扬，却在得知主考官是不正之人后拒绝参加不公正的考试。西方人对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们将凭借科考成功而做官的人称为“老爷”，将应试者称为“囚犯”，将等待中举结果的过程戏称为“等待判决”[38]，实则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科举制度在选人方面存在的巨大弊端，即为官者的任意选择性危害了国家制度公正，导致人才埋没等伦理问题。在『聊斋志异』中连冥界都有选拔随意性很大的科举考试，可见连做鬼都逃不过这种不正当制约的伦理困境。

『天倪录』中通过『御史巾帼等筵上』和『提督裸裎出柜中』这两则故事表现官吏不能坚定正义的伦理立场而出丑，由此窥见社会伦理秩序的混乱。御史和提督总是目中无人，自命不凡，又难敌美色的诱惑，最终御史被迫穿着女装出现在众人面前，而提督则全裸被人发现。二人因品行不端，道德败坏而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御史主要负责监察各级各类官员的言行，提督是掌握兵权的大总官，任堕却将权力较大的这两位官员塑造成了不务正业、因贪恋美色而丢尽脸面的丑恶形象，表现出封建统治下政治伦理秩序混乱的伦理环境。

此外，『天倪录』中虽没有以科举制度为主题的篇目，但科举制度一般都穿插在某些故事之中。诸如『广寒楼灵巫惑倅』中宋公与友人一同“科场赴举，仕宦登朝”[39]；『扫雪因窥玉箫仙』中曹左郎携青梅竹马紫鸾出逃，紫鸾却劝他应该考取功名回去向父母谢罪，最终左郎做了状元，皆大欢喜等情节，都证明科举制度在当时显而易见的崇高地位，是成功人士的不二选择。因此，『天倪录』应该是将科举制度视为一种得道的正当方式进行颂扬的。

社会批判类型叙事的伦理结多为预设，暗示矛盾的不可调和，故事结局也并不是对其进行解构，反而借此提出了伦理问题。官吏制度和科举制度都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统治的深刻反映，因这些制度执行者和拥护者的错误伦理认知，导致政治伦理秩序的混乱。『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中对封建制度的深刻描摹，突出了伦理秩序混乱下不同层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冲突等伦理困境，展现出了作家对开明君主和公正执法的期盼等较为先进的伦理意识。

2）伦理结的传统解答——因果报应叙事的伦理意识

37)袁娅楠，「『聊斋志异』科举题材小说研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p.51。
38)金程丰，「明清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官吏制度的认识」，『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2000，p.93。
39)임방 지음，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2005，p.484。

伦理叙事中伦理结的形成和解答互为表里，伦理结的解答是从反方向对伦理结的形成原因进行倒推和阐释，也是伦理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中涉及因果报应伦理思想的篇章数量较多，作者对伦理问题的伦理态度和解决方式同时也隐藏在其中，作品假托鬼神故事，是为了通过这种较为夸张的果报形式，达到伦理启示和伦理训诫的重要意图。但此种解答只是旧时代社会和思想封闭状况下的传统意义上的一种消极处理方式，并非伦理矛盾的真正消解。

人类社会在早期发展时由于不能对异常天象或梦境幻觉等事物做出合理解释所以提出了“万物有灵”之说，当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限制时又逐渐形成了趋利避害、善恶报应的思想观念。其后的因果报应思想实际上是由儒家传统报应观，道教“承负说”与佛教“缘起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发展的。[40]因果报应观念故事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文学文本当中，传达着善恶终有报的普遍伦理道德意义。

『聊斋志异』中的因果报应故事具有善恶皆报应不爽；报应时间不一、途径不一；报应有承负；报应有原则四个基本特点。[41]果报故事的叙事模式以及匠心独运的人物情节安排也从另一方面具体地表达出了作家独有的文学审美个性和伦理意识。在『聊斋志异』中，因果报应型叙事种类众多，且大部分与鬼神或梦境有关的故事都与因果报应关系紧密。有的属于因果报应中的前奏，起到报应预警的作用；有的属于报应惩罚，起到训诫的作用。特别是阴间断案故事，是作者发挥大胆想象的设置，表达了对正义伦理的迫切渴望。作者的深刻寓意总是隐藏在环环相扣的因果报应和伦理矛盾冲突之后，因果报应故事实则是为作者的精神寄托服务的。

『三生』是典型的轮回报故事，刘孝廉一世为官绅，阎王查到其生前过失后贬他转生为动物，此处伦理结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刘氏却不明因果报应症结之所在，不甘为物的他屡次尝试转生成人，皆因惩罚期限未满而失败，终于在第三世做蛇之时他因没有害人而成功转为人类，至此因果报应观念已经根植于他的心中。蒲氏借用故事中刘氏生死轮回中善与恶之间的伦理矛盾和冲突，讽刺了那些人面兽心的小人，因果报应和哲理问题互为表里，增加了因果报应叙事在小说中的深刻意义。『邵女』中善妒的正妻金氏对邵女实施鞭打、烙印、针刑，此后金氏多次生怪病，邵女屡屡为她用针才能好转片刻。此处伦理结为预设，先前故事中并未指出邵女受到针刑与金氏挨针这两者之间的客观联系。一日鬼神向金氏托梦她方才醒悟，此乃先前她虐待邵女应有的报应。金氏痛改前非后不再得病，妻妾之间伦理冲突的真正消解也蕴藏着伦理结的解构过程。作者在“异史氏曰”中提到对金氏的训诫时说，“如数以偿，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42]可见因果报应具有普遍性

40) 马李莉，「宋代文言小说报应题材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p. 12。
41) 赵玉霞，「『聊斋志异』与因果观」，『蒲松龄研究』，第2期，2017，pp. 79-81。

和原则性。『聊斋志异』中讲因果报应，不拘于任何的时间和形式，且非常具体细致。如『汤公』中汤公死时身上的一口血气，可以随着他回顾人生中所做的善恶事而发生变化。『丐仙』中高玉成对伪装成乞丐的仙人有恩，仙人邀他宴饮，可当高玉成想要轻薄仙子的时候，仙子却直接化为了令人恐惧的夜叉。又如『布客』中详细描写了商人和冥界差役之间的交往，使全篇的各处果报都合情合理。

『天倪录』中的因果报应故事，大多数都与仙人神迹有关，且善报大体上多于恶报，若有恶报，也是作者希望以这些故事为反面教材劝诫人们应当向善。『天倪录』中的果报情节安排简洁易懂，但较为随意，无直接性的规律，尤其是恶报的对象往往直接针对群体。如『一门宴顽童为疠』中宾客对顽童无礼，后知后觉的他们跪拜也毫无用处，参与宴会的人全部毒发身亡。『故相第蛇魂作祸』中因这家人用残忍手段害死大蟒，一家上下皆死，就连进入他们家的人也无一幸免。这些类型叙事中的伦理结往往是后置的，通过设置悬念的方式使人与物之间的伦理矛盾始终存在，加强了故事的训诫作用。『天倪录』中的仙人故事多为善报，如『智异山路迷逢真』中仙人报答官人的知遇之恩，使官人得以无疾而终。『关东路遭雨登仙』中，老实贫苦的书生最终娶了仙娥，成了仙人。仙人会与人类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时也会施展神迹，警示灾难，但有时并不刻意要求人类的回报。作者任堕主要通过果报叙事，劝导人们应晓善恶，明事理，因果报应型叙事在这里更多地发挥着教化民众的一般性作用。即“因果报应论”对于政治统治而言具有极大的社会稳定意义[43]，作者也在创作过程当中不自然地受到了这种影响。

由于封建社会时期法律和道德伦理的不健全性，才使作者结合传统果报思想提出了通过鬼神惩罚，或天理报应这样的方式来劝善惩恶。因此两部作品中的因果报应叙事实质上属于作者主观情感上的一种设置，具有局限性。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鬼神或来世，善恶并无报应，作者是寄希望于此，来缓解现实生活中不能解决的伦理问题和伦理困境。

3）『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伦理结中伦理意识的比较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中的伦理意识是通过巧妙设置的伦理线与形成或解答的伦理结这两种不同的伦理结构来进行具体表现的，主导性伦理问题在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之中产生的伦理困境和冲突——伦理结，是通过类型叙事中矛盾成因的预设与后置的不同反映方式，以及因果报应叙事中对伦理问题的传统消解一起构成作品的节点性伦理结构。两部作品类型叙事中伦理结的形成主要表现在婚姻家庭类型叙事中的伦理禁忌，社会批判类型叙事中的伦理混乱，伦理结的传统解答则体现为因果报应叙事，伦理结的形成和解答过程传

42)蒲松龄著，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p.885。
43)张践，「因果报应论对传统政治正义观的补充」，『理论学刊』，第1期，2007，p.39。

达出作者对处理伦理矛盾和冲突的重要态度。

在婚姻家庭类型叙事中，『聊斋志异』擅长用伦理结的后置来塑造冲击伦理禁忌的主要人物，表现他们在家庭生活中积极寻求思想解放和婚恋自由的优秀品格。例如江城的悍妒原因是在故事的后半部分才揭示其缘由，如此安排布局达到了发人深省的伦理启示效果。『天倪录』中多用预设伦理结阐发悍妒妇的不端行径，表达对封建家长制的维护。例如『禹兵使妒妇割髯』中统使目睹禹兵使妻子的彪悍行为后，将其丈夫罢免，认为一妻不治，何以统兵。这是封建男权社会行为的典型体现。在社会批判类型叙事中，蒲氏不仅批判社会不良风气和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还在『促织』中提出了对最高统治者昏庸享乐的不满。尤其通过地府判案、冥界科举等幻想的方式来突出地表现对平等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希冀。例如『续黄粱』中曾某在地狱中受到的多种折磨都源于他在现实中的作恶，表达了作者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天倪录』中多用衬托手法侧面表达官吏的不当言行，例如用妓女过于聪敏机智的举动，来反衬御史和提督的愚蠢及大意，伦理批判意味较轻。

在因果报应叙事中，两位作者对因果报应伦理思想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作品中对伦理结的消解的不同处理手法。『聊斋志异』的作者大致对伦理行为和祸福的因果关系表示了肯定的态度。所以『聊斋志异』的果报有具体性和原则性，例如『邵女』中对善妒的金氏进行惩罚，只是在扎针上如数奉还，如此小惩大诫，是期望她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改邪归正。体现出作品努力探索伦理问题的妥善解决方式的优秀伦理意识。但蒲松龄也深受因果报应“非大善不可不挽”的思想，显示出儒家书生的精神上的局限。『天倪录』的作者对因果报应虽然也较为推崇，但对其持有不确定的态度，因此作品中因果报应的规律也并不统一。『天倪录』的因果报应覆盖面积广，有以恶劝善的鲜明特征，揭示了作品借果报摆正人们道德伦理的教化性意识。例如『故相第蛇魂作祸』中，蛇魂的报复性极强，具有连带性责任的人也无一幸免，可见『天倪录』因果报应的广泛性。

总之，『聊斋志异』中的类型叙事在伦理结的设置和解答，伦理叙事的手法方面相对来说比『天倪录』的艺术成就要高，表达的伦理意识更加深刻。『聊斋志异』伦理结中的伦理意识体现为，以独特的情节设置打破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平衡，用以虚写实的方式扩大了作品中的伦理矛盾和冲突，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理想人生的期待。而『天倪录』伦理结中的伦理意识体现为，以考证的口吻进行伦理叙事，主要通过奇异故事来指明当时社会中的善恶美丑，隐含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下层民众的规劝。

4. 结语

本文以中韩两国志怪题材文言小说中的代表作『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分析作品中的伦理结构和伦理意识。『聊斋志异』与『天倪录』的伦理意识均表现在作品的伦理线和伦理结这两种线性和节点性的不同伦理结构之中。作品的艺术设置中体现出的伦理线汇集了作家的伦理思考，奠定了作品的伦理基调。首先表现为『聊斋志异』中对非人形象的塑造和他们的伦理活动中，以非人隐喻人与人之间的辩证伦理讨论；其次表现为『聊斋志异』自我评点中的主观激进性伦理认识和『天倪录』自我评点中的客观保守性伦理认识。文学文本中的伦理结又是伦理线上的伦理问题的具体反映，作品类型叙事中的伦理结是作品中伦理矛盾与冲突的真实体现，展现了作品的伦理深度。其中婚姻家庭内的成员因触犯封建伦理禁忌导致自己陷入了伦理困境；封建制度的执行者因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和伦理认知的偏差导致社会伦理秩序产生混乱，以及在因果报应观念影响下产生的对伦理问题的传统消解方式中均体现了伦理结构中伦理结的形成和解答过程，以此来分析伦理问题的最终走向。

『聊斋志异』与『天倪录』都主要论述了封建社会伦理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作者自我评点中的深刻伦理内涵，以及具体伦理矛盾冲突下的伦理困境与解决。通过两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之间的充分比较，笔者认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聊斋志异』中的伦理意识趋向于复杂，作者蒲松龄的创作时代处于明清交际，社会动乱、文字狱盛行，他既体悟到朝代更迭时的困苦生活，深谙黎民百姓的苦难和困顿，因此关心民生疾苦；又因自己一心向往科举，却屡次不中而心存愤懑。因此，蒲松龄在表达自己的伦理态度与感情时，虽以鬼神故事为主体，却陈情激昂。『聊斋志异』中的伦理意识观念与『天倪录』相比来说较为主观先进一些，其叙事多表达对封建伦理环境的不满与对理想伦理社会的憧憬。

『天倪录』中的伦理意识具有较为普遍的道德束缚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立的性质，作者任堕受到朝鲜性理学的诸多影响，以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悟出发进行创作。他一生虽有波折，但也为官数年，所以他的思想状态并未能完全脱离士大夫阶层的传统认知，他希望通过异人谈为士大夫阶层树立普遍的自信，以此来拯救文人的精神危机。『天倪录』中的伦理意识观念与『聊斋志异』相比来说较为客观保守一些，其叙事多为表达教化民众的主要目的。

两部作品均对人的命运与现世问题表示关注，寄托了作者的人生志趣。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作品进行解读，揭示出文学文本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和矛盾冲突之所在，是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伦理理论分析之间的碰撞。

【参考文献】

〈单行本〉
임 방 지음, 정환국 옮김,『천예록』, 성균관대학교출판부, 2005.
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马振方主编,『聊斋志异评赏大成』,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蒲松龄著, 朱其铠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韦勒克、沃伦, 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 三联书店, 1984.

〈论文〉
박현숙,「조선후기(朝鮮後期) 야담집(野談集) 소재(所載) 기이담(奇異談)의 특성(特性) 고찰(考察) -『천예록(天倪錄)』을 중심(中心)으로」,『어문연구』, 제36권 제2호, 2008.
이근석,「『요재지이(聊齋志異)』의 논찬(論贊)으로 살펴본 이야기의 윤리적 기능」,『중국어문학지』, 제63집, 2018.
邓大情、林 青,「中韩古代小说自我评点之比较——以『聊斋志异』和『天倪录』为中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2014.
韩宇翔、朴明真,「流媒体平台上以『西游记』为原型的IP产出与市场反应——以动漫『西行纪』为中心」,『中国学』, 第80辑, 2022.
黄英龙,「『聊斋志异』曲终奏雅艺术探析——评“异史氏曰”的得失」,『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第3期, 2009.
金程丰,「明清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官吏制度的认识」,『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第5期, 2000.
刘尚云,「论『聊斋志异』叙事主体的自觉意识」,『长城』, 第12期, 2009.
李 娟,「“异史氏曰”——『聊斋志异』中的干预叙述者」,『河池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期, 2006.
赵玉霞,「『聊斋志异』与因果观」,『蒲松龄研究』, 第2期, 2017.
张 践,「因果报应论对传统政治正义观的补充」,『理论学刊』, 第1期, 2007.
张慧禾,「『聊斋志异』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语文学刊』, 第5期, 2004.
马李莉,「宋代文言小说报应题材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袁娅楠,「『聊斋志异』科举题材小说研究」,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0.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요재지이』, 『천예록』, 윤리선, 윤리결, 윤리의식
	영문	『LiaoZhaiZhiYi(聊斋志异)』, 『TianNiLu(天倪录)』, Ethical line, Ethical knot, Ethical Consciousness

A Comparison of Ethical Structure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LiaoZhaiZhiYi(聊斋志异)』and『TianNiLu(天倪录)』

Cheng Zhu-Hui · Park Myung-Jin

The universal ethical phenomenon in literary texts is a key concern in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Ethical issues in literary works are reflected in ethical line and ethical knot, and the two together weave the entire literary text. The ethical structure deeply reflects the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works. Among them, the ethical line shows the main ethical line of the work and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eading ethical issu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 The ethical knot shows the basic ethical issues,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works,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and resolution of ethical dilemmas from the microcosmic aspec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strange novel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LiaoZhaiZhiYi(聊斋志异)』and『TianNiLu(天倪录)』, to explore the ethical consciousness embodied in the works. The ethical structure and ethical connotation in the works are mainly analyzed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ethical line in the artistic setting of the two works and the ethical knot in the ethical narrative.Including the embodiment of non-human images in the art setting and the author's self-evaluation on the ethical line,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knot by the genre narrative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al knot by the karma narrative.Using the analytical method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explore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thical consciousness and ethical connotation reflected in the two works, explain the ethical issues and ethical reas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imes, and provide ethical inspiration.

저 자	제1저자	청쭈후이 / 程竹慧 / Cheng Zhu-Hui				
	교신저자	박명진 / 朴明眞 / Park Myung-Jin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3.08.09.	심 사 일	2023.09.02.	게재확정일	2023.09.13.